

中华美国学会

中华美国学丛书

石 斌 著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 (1952-195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华美国学丛书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

(1952—1959)

石 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石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6

(中华美国学丛书)

ISBN 7-5004-4510-5

I. 杜… II. 石…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现代 ②美苏关系-研究-现代 IV. D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7647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875 插 页 2

字 数 370 千字

定 价 3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言	(1)
----------	-----

导论 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1)
------------------------	-----

一 从“传统派”、“修正派”到“后修正派”	(2)
-----------------------------	-----

二 众说纷纭的个案	(11)
-----------------	------

三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政策	(15)
--------------------	------

四 思想方法的解读	(20)
-----------------	------

五 问题的提出	(24)
---------------	------

第一章 “苏联挑战的性质”与美国—西方的战略

——思想背景溯源 (1919—1952)	(47)
----------------------------	------

一 “和平变革”之政治哲学	(49)
---------------------	------

二 对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挑战”	(55)
-----------------------	------

三 以“压力”促“变革”	(71)
--------------------	------

第二章 对苏基本战略：在“遏制”与“解放”

之间 (1952—1955)	(100)
----------------------	-------

一 党派政治与外交政策：“遏制”之上抑或“遏制”之外？	(101)
二 “安全”与“繁荣”之双重目标	(110)
三 “光照室计划”与 NSC162/2 号文件	(120)
四 “报复”乎？“威慑”乎？	(135)

第三章 对苏东的意识形态战略：从“激变”到

“演变”（1952—1956）	(157)
一 “解放”口号的实践内涵	(159)
二 初露端倪：对东德骚乱的“政治反应”	(165)
三 NSC5505/1 号文件：“演变”战略正式出台	(180)
四 波匈的检验：“演变”战略完全定型	(187)
五 “演变”战略的实质	(197)

第四章 战略重估与微调（1956—1959）

一 “报复”战略的逻辑困境与现实障碍	(215)
二 政府内部的分歧与杜勒斯的摇摆	(219)
三 有限的政策调整	(237)

第五章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的困境（上）

一 “和平的机会”与美国的消极态度	(266)
二 谈判的限度：缓和、裁军、最高级外交	(283)

第六章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的困境（下）

一	“共同防御”与欧洲的现实	(325)
二	对柏林危机的“双管炮”战术	(346)
余论 观念与现实的冲突		(388)
附录一 杜勒斯出任国务卿之前的主要经历		(409)
附录二 大事年表		(412)
参考文献		(430)
后记		(458)

导 论

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外交史和冷战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毛泽东曾经对之高度重视，称之为美国“真正掌舵的”。^[1]在中国，他大概是战后以来形象最糟糕的美国政治人物了。苏联人曾经骂他“战争贩子”，我们称之为“50年代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扩张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共反华的急先锋”，“最好的反面教员”。^[2]在西方，却有人将他捧为美国“最伟大的国务卿”，“20世纪的梅特涅”，^[3]“自由世界外交领袖”。^[4]然而时过境迁，在他死后不到30年，又有人将他评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五个国务卿之一。^[5]五六十年代，许多美国人认为他过于看重意识形态，太顽固、太僵硬，“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甚至说他对50年代的国际现实缺乏基本的把握。最近二十多年来，又有不少人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发现有两个杜勒斯（尽管这两个常常互相纠缠，有时不大好区分）：一个是“公开”的杜勒斯——道德主义者，以正义和真理的化身自居，狂热反共、强硬好斗、喜欢说教，人称“国际诉讼律师”、^[6]半心半意的“道德家”；另一个是“私下”的或曰“深藏不露”的杜勒斯——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至少是实用主义）政治家，经验丰富、思想深刻、头脑冷静。那么，究竟哪个杜勒斯更真实呢？如果两种说法都有点道理，哪一个与50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关系更紧密呢？

美国外交史学界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研究虽然已经走过了一轮“正一反一合”的发展历程，关于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及其政策影响，仍然歧见纷呈。因此作者试图首先对四十余年来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有关研究作一个总结和评价，这既是对本书选题的一个论证（说明为什么要研究杜勒斯，以及为什么要从美国对苏战略这个角度进行研究），也是为了提供一个可资对照的学术史背景。

一 从“传统派”、“修正派”到“后修正派”

四十多年来，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到“后修正学派”的演进历程。^[7]“修正派”是对“传统派”的否定，“后修正派”则大体上是否定之否定。导致这种具有史学运动性质的学术变迁的原因，固然主要是由于最近几十年来人们能够接触的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档案材料大大增多，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同时也是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很不相同，随着时势的移易，观察的角度和评判的标准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对杜勒斯的研究和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这几股史学潮流的左右，随着它们的潮起潮落而呈现出一幅幅变动不居、万花筒般的图景。

研究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外交的“传统派”从20世纪50—70年代末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五六十年代，大多数人认为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研究者们对杜勒斯的兴趣远远超过对艾森豪威尔的关注，因而对杜勒斯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杜勒斯的传记和研究专著大部分都产生在这一时期。^[8]这些著作多出自著名报刊记者和政府工作人员之手。其中《时代》周刊记者J.R. 比尔所

写的《杜勒斯传》是杜勒斯本人生前认可的传记，在介绍杜勒斯的生平事迹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且较少后世史家著作中常见的那种时代隔膜。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迈克尔·古欣的《杜勒斯：一个政治家及其时代》，结合杜勒斯的政治哲学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颇具理论色彩的探讨，对杜勒斯的赞誉以此书为甚。前空军部副部长汤森·胡普斯的《魔鬼与杜勒斯》则代表了对杜勒斯的批评。杜勒斯的妹妹（曾是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埃莉诺·杜勒斯专门叙述了杜勒斯生前最后一年的活动。H. 芬那的《杜勒斯与苏伊士运河危机》则是“传统派”在这一个案上的代表作。此外，一些政治学者如 O. 霍尔斯特还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杜勒斯的个性、认知能力、信仰体系以及行为模式等进行了探讨。^[9]

大部分 70 年代以前的著作，将杜勒斯描写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者”、“缔造者”、“设计师”。^[10]这是“传统派”的一个主要特征。其中《边缘上的决斗》一书所作的评价很有代表性：“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提出政策的是他，说服总统的是他，推行政策的也是他。在他担任国务卿的六年中，他实际上成了美国权力的指挥者。整个世界也有这样的看法。”^[11]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也认为，艾森豪威尔完全信任杜勒斯并且十分钦佩其才干，因此只要总统认为合适，总是放手让杜勒斯去自由处理美国的外交政策。^[12]

官方的意见自然以艾森豪威尔的评价为代表，他在 1953 年 5 月 14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始终认为他是外交活动的专家。他知识丰富，起码在他的专业方面称得上是一个‘博学’者。而且，他是个忠于职守、不知疲倦的人——他热爱美国，珍视人的尊严和道德价值。”1956 年 1 月 10 日他又写道：“在外交方面，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人具备像福斯特·杜勒斯那样的专业水平。……他是一个博学和道德勇气的人”，是“反对共产帝国主义的种

种阴谋的坚强堡垒”^[13]。杜勒斯因病辞职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做出一个决议，高度评价杜勒斯在国安会的作用，其中写道：“杜勒斯参加了这一机构的几乎所有会议。给国安会带来了极为清晰的思想，明确的表述，准确的判断和坚定的立场，正确且前后一贯的政策阐述。”总之，杜勒斯对国安会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14]。杜勒斯去世后，艾森豪威尔在公告和讲话中称杜勒斯“高举自由的大旗，促进正义的事业”，是“我们时代真正的伟人之一”，“自由的卫士”，“专制的敌人”^[15]。这些盖棺论定式的公开评价虽然有套话的成分，其基调却耐人寻味。

严格地讲，“传统派”虽然强调杜勒斯的作用，但所谓“设计师”、“主要推动者”之类的说法，在许多作者那里并不意味着是对总统的威望和最后决定权的否定。他们的本意多半是，由于杜勒斯擅长思考，精于策划，艾森豪威尔充分信赖杜勒斯，而后者也十分尊重总统的意见，虽然杜勒斯总是倡议者，但事事都要请示汇报，“小心翼翼地尊重艾森豪威尔那种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力”。此外，杜勒斯往往站在前台，充当发言人，开展穿梭外交，给人留下主宰一切的印象，如果他有什么权力的话，主要得益于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相互信赖和尊重，如此而已。大多数“传统派”著作对此说得很明确，因为杜勒斯毕竟不是总统。^[16]不过，他们确实偏重杜勒斯的作用，强调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认为大多数政策构想都出自杜勒斯。事实上，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的许多著作都将艾森豪威尔描写成“老板”，杜勒斯要有所作为，离不开总统的支持和信任。^[17]如果说这种提法还比较模糊的话，随着“修正派”的出现和壮大，艾森豪威尔的中心地位也就确定无疑了。按照“修正派”的观点，艾森豪威尔的中心地位就在于：所有“要执行的政策都是椭圆形办公室做出的”，如不动用空军支援奠边府的法军，要求英法军队撤出苏伊士运河，

命令美军在黎巴嫩登陆等等，尽管艾森豪威尔在公开场合称其政策皆出自国家安全委员会。^[18]艾森豪威尔自己也曾夸口说：“在美国，只有一个人比福斯特·杜勒斯对外交政策知道得多，那就是我。”^[19]

“修正派”的主流地位是在 80 年代确立的。^[20]但具有“修正派”性质的研究成果在 70 年代就已经大量出现。^[21]这既得益于文献的增多，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艾森豪威尔的声誉在 70 年代以后直线上升，与经历了越战创伤、经济危机而情绪低落美国公众对 50 年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相对和平与繁荣局面的怀旧情绪直接有关，有关研究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特征。^[22]1975 年以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大量官方和私人文件逐渐开放，其中包括“总统文件”即所谓“安·惠特曼文件”（Ann Whitman Files），^[23]艾森豪威尔政府举行的 366 次国家安全委员会^[24]会议的详细记录，安德鲁·古德帕斯特（Andrew J. Goodpaster）将军相当准确地记录下来的艾森豪威尔在其主持的秘密会议上与外交政策官员们的谈话备忘录。这不但直接推动了“修正派”史学的发展，还使得 70 年代后半期和整个 80 年代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艾森豪威尔时代”。

罗伯特·迪万、弗雷德·格林斯坦和史蒂芬·安布罗斯等人在 80 年代初发表的著作，^[25]使艾森豪威尔“修正派”史学的基本格局得以正式确立并占据统治地位。

1981 年罗伯特·迪万发表《艾森豪威尔与冷战》一书，总结了 70 年代的“修正派”成果，重新界定了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在决策中的关系。他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作用被严重低估，艾森豪威尔主要是利用杜勒斯，他自信自己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但他需要一些具有外交知识与技巧的人。在迪万看来，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功绩有：结束了朝鲜战争；在印度支那、台湾海峡、苏伊士运河以及柏林等危机期间避免了军事干预；停止了大气层核实验。

尽管这些成就“本质上是否决性的 (negative)”，主要得益于他的自我克制，而且他未能实现缓和冷战、制止核军备竞赛的目标，但他使冷战得到了控制，避免了核战争，其稳健、审慎和克制是其继任者们所难以企及的。^[26]

在迪万的影响下，此后的“修正派”史家充分肯定艾森豪威尔在外交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安娜·纳尔逊通过研究艾森豪威尔同国安会的关系也得出结论：“处于权力中心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27] 弗雷德·格林斯坦则认为，以往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艾森豪威尔在领导艺术方面的“隐蔽” (hidden - hand) 风格，在公开场合下艾森豪威尔成功地树立了热情、友好、含糊其词的形象，在私下则是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他在幕后控制着决策过程并做出了一系列关键的决策。但为了回避抨击，避免分裂，维护自己的领袖形象，他往往不愿公开表明个人的立场和作用；当他想表明自己的意图时，他就授权杜勒斯等人来充当其冷战政策的“避雷针”。^[28]

“修正派”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大概要数安布罗斯根据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档案材料写成的两卷本《艾森豪威尔传》。该书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最大成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主要理由其实就是艾森豪威尔自己所说的、在其任内“美国没有丧失一名士兵，一英尺土地。我们维持了和平”。安布罗斯也认为，艾森豪威尔“喜欢作决定”，“处于事件的中心”，“主宰着一切”。他的缺点是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过分敌视和怀疑，以至于胜过了他对军备竞赛的担忧，而且，他常常搞不清楚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29] 安布罗斯还指出，批评者往往指责杜勒斯在反共方面过于僵硬和简单化，其实，他在这方面并没有超过艾森豪威尔本人，制定政策的是艾森豪威尔，但对于具体问题的失败，责备杜勒斯比责备艾森豪威尔“更容易、更方便，也更有利”。有杜勒斯作为“避雷针”符合艾森豪威尔的目的，也有助于保持艾森豪威尔

的声望。^[30]

相对而言，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的看法就不那么极端。加迪斯的讨论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入手。在《遏制战略》一书中，他认为，“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思想才智方面的相似性导致了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之间这种奇妙的‘伙伴关系’”；“主要由艾森豪威尔界定政府应该追求哪些利益，而由杜勒斯确定这些利益面临哪些威胁”；“主要是由杜勒斯确定政府战略的‘性质’，即抵御威胁的反应方式的选择，而总统对战略应如何将反应方式与根本利益联系起来有更为敏锐的意识”。在对外事务方面，杜勒斯从未享有过杜鲁门在 1949 年以后曾经给予艾奇逊的那种自由度，尽管从表面上看情况刚好相反。但杜勒斯比艾森豪威尔更有韧性，因而有时候即使面临总统的反对，他也能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反复的尝试达到目的。“结果产生的是某种混合物：一项战略是两个私交很好而脾性大不相同的人共同的产物，既表现出彼此的克制、合作与相互尊重，也反映了紧张和妥协。”^[31]

另一位著名“修正派”学者理查德·伊默曼的观点则更明确，在承认艾森豪威尔处于中心地位、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前提下，他强调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是密切合作的关系，不存在谁操纵谁的问题，杜勒斯享有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32]伊默曼 1999 年又出版了《杜勒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虔诚、实用主义与权势》一书，这是迄今为止研究杜勒斯的最新专著。伊默曼在该书最后特别指出，杜勒斯与其顾问、国安会成员特别是总统的关系值得称道。他与艾森豪威尔彼此相互尊重，并一致认为个人利益或政党利益不应该妨碍国家事务。“决定总是由艾森豪威尔做出，但总是与杜勒斯商量过后才做出。”两人的关系堪称楷模（a model relationship），在 20 世纪甚至整个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33]

概言之，“修正派”的核心观点有二：其一，艾森豪威尔不仅是掌握实权的总统，而且还是一位精明干练的总统。其外交政策相当成功。他始终控制着决策过程，他的政策经过深思熟虑，前后连贯、有条不紊。他审慎、克制，是处理国际事务的行家里手，最擅长处理国际危机。他骨子里虽然强烈反共，但出于现实的考虑，也曾尽力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尽管未能一以贯之，也基本上没有达到目的；其二，必须将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公开使用的辞藻与实际考虑区别开来，尤其不能把杜勒斯激烈的反共言论当作政府的政策。杜勒斯不过是艾森豪威尔的挡箭牌。

80年代以来有关杜勒斯的专著不多，而且全部以1953年为下限，其中R.W. 普鲁森的《杜勒斯：通向权力之路》（1982）被认为是关于53年前的权威传记，M.G. 图鲁斯的《杜勒斯的转变》一书（1985）专门研究了杜勒斯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宗教观在50年代以前的几次变化，A.C. 阿伦德的《谋求正义与持久的和平》（1988）则对1953年前杜勒斯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作了相当详尽的讨论。^[34]但以论文为主的有关50年代的专题研究仍然相当可观，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化，研究范围也有所拓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材料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的深入，“修正派”的一些观点开始受到质疑，一些“修正派”学者也在重新检讨过去的结论。这一动向的集中反映，是1988年普林斯顿大学纪念杜勒斯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几组重要论文。^[35]对于这一新的研究动向，早已有美国学者笼统地冠以“后修正派”之名。^[36]但“后修正派”研究尚在发展之中，不仅远未取代“修正派”的主流地位，就其尚未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而言，甚至很难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派，更何况这种“对修正的修正”有时也出自“修正派”阵营内部。例如，理查德·伊默曼、约翰·加迪斯这样的“修正派”重要人物，实际上都在重

新审视和局部修改自己原来的观点。伊默曼在1979年发表的《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谁作决定？》一文对那种认为杜勒斯是主要决策者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对“修正派”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37]但他后来强调，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密切合作的关系，在某些领域或某些问题上（如欧洲经济、军事联合问题）杜勒斯也能发挥主导作用。^[38]伊默曼在1999年出版的新著里甚至也称杜勒斯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师”。^[39]加迪斯在80年代初出版的《遏制战略》一书中就声明自己与“修正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加迪斯当时并未完全脱离“修正派”的窠臼，对杜勒斯也颇有微词，认为他过分看重了意识形态因素。加迪斯在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又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40]

因此，所谓“后修正派”实际上还是一个内涵比较模糊的概念，除了一部分立场比较鲜明的作品外，^[41]并无十分确切的指向，可以用来泛指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所提出的一些相对于“修正派”而言的新问题、新观点，或新的研究视角，无论其目的是出于对“修正派”的批评、补充还是再修正。

不过，我们大体上还是可以看到“后修正派”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一，他们不像“修正派”那样充分肯定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能力并对其大多数政策给予很高的评价，而是毁誉参半，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强调艾森豪威尔虽然避免了战争，却并未赢得和平。他在其顽固的反共观念支配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一些愚蠢的冒险活动，对越南等地区承担长期的义务，对秘密外交和隐蔽行动的偏好，对一些臭名昭著的反共独裁者的大力支持等等，从长远看是否真正符合美国的利益，很值得怀疑。^[42]其二，他们也不同意“修正派”过分强调艾森豪威尔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绝对权威，贬低甚至忽略包括杜勒斯在内的政策顾问们所起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他们认为参与决策

的其他一些人物，绝对不像某些“修正派”学者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些唯唯诺诺、完全受艾森豪威尔支配的人物，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对问题的轻重缓急有自己的判断，有时候甚至不顾总统的意愿而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43]对于杜勒斯，有的“后修正派”学者不仅肯定他的主导地位，还对他的外交政策做出很高的评价，如 F.W. 马克斯三世的《权力与和平》。^[44]有的主要强调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如 D.W. 拉尔逊认为，杜勒斯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约束了艾森豪威尔对苏缓和的热情，例如，斯大林去世后艾森豪威尔发表的《和平的机会》演说，经过杜勒斯的加工，艾森豪威尔原来那种和解的口吻被大大减弱。^[45]也有许多“后修正派”学者承认艾森豪威尔的核心地位，只是对他的政策褒贬不一。^[46]因此对“后修正派”的观点不能一概而论。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包括“修正派”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提出，杜勒斯“是一个比通常人们认为的还要复杂的人”。^[47]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出，“传统派”尽管大多认为杜勒斯在政策制定上起主要作用，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对其政策批评多于赞誉，而且无论赞扬他的人还是批评他的人都承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杜勒斯的公众形象都不大好。他的道德说教、好斗姿态、反共狂热、阐述政策时所采用的夸张辞藻和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使一些人对他产生反感。^[48]有的批评者甚至认为他很盲目，缺乏现实感。总之，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修正派”不仅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主要决策者，而且还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决策者。对于杜勒斯，“修正派”一方面认为他的权力远没有人们过去认为的那么大；另一方面，既然认为政策都是艾森豪威尔制定的，杜勒斯只不过是执行者，而且“修正派”对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评价甚高，因此，他们又不同意“传统派”根据杜勒斯的公开表现所得出的某些片面和

简单化的结论，对杜勒斯的批评反而较“传统派”为少。“后修正派”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他们大体上是想通过利用一些新近公布的材料，对“传统派”和“修正派”的研究成果进行新的综合，其中也包括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间建立某种新的平衡，因此有明显的折中色彩。过去几十年对杜勒斯的研究，一言以蔽之，仍不外乎美国学术界常见的由“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路数。

因此可以说，自“修正派”出现以来，就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而言杜勒斯的地位总体上看已大为下降，从主角降为主要参与者，但形象却在不断改善，尤其在一些“后修正派”史学家那里。自80年代后期以来，对杜勒斯的评价又有上升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更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杜勒斯所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认为杜勒斯是一个思想深邃、性格复杂的人物，其公开言论和公众形象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并更多地强调其灵活务实的一面。实际上，随着两极格局的逐步瓦解，冷战高潮时期的美国领导人声誉都在不断攀升（杜鲁门近年来已是排名第一的战后总统）。这一学术变迁的国际背景和心理根源是显而易见的。

二 众说纷纭的个案

“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的划分，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它们对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想法不同；二是它们对杜勒斯或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的总体评价也不同。这大致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研究的阶段性，但显然这并不等于各学派内部在每个具体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共识或者各学派之间就没有共同点。这种划分是相当粗略的，实际情况要远为复杂，因此，还有必要从一些具体问题入手，对代表性的观点和主要争论作一个简要的评述。